

允許粵鹽入湘的辦法，這是對市場需要所形成的食鹽銷售格局及於其之上的鹽區觀念的承認。

正是在充份觀照不同人群進行活動時的制度與市場環境的基礎上，通過歷時性地考察湘粵贛界鄰地區食鹽專賣制度演變過程中所見的「鹽區」與「鹽界」等概念，作者得出以下結論：「區域是不同人群的觀念，是人們的認知，是長期歷史時間的空間表現，區域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固定的概念，它具有多層次、多向度、動態而易變的特點。任何研究者從一個大的國家或地區劃分出來的區域，哪怕其具有其合理性，也不可以被其他研究者不加分說地加以利用。作為區域連接處的界，同樣是長期歷史過程的結果，在傳統時期，它常常是動態的、彈性的地區，並且在市場格局下，扮演着特定的區域意義。」（頁34）作者是在吸收人類學、地理學與歷史學等不同學科有關區域研究的既有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從人群的觀念與認知層面來探討「區」與「界」的。這種角度，自然超越了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社區理論及由此而建構出來的中華帝國晚期區域經濟理論，作者寫作此書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觀念與認知得以產生與變化的把握，是建基於作者對不同人群的諸多活動的考察。既然人群的活動是在一定的國家制度與市場運作環境中進行，則要求研究者必須對此制度與市場環境有深刻的了解。如此，可以說《區與界》一書在此方面新立了一種典範，足為將來繼起者所必須參考。

黃壯釗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By WEN-HSIN YE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xiii, 305pp.**

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一股試圖恢復民國生活方式的廣泛熱情，民國日曆、民國海報、民國照片等大量民國遺物的出現標誌着一股復古潮流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文字與光影構成的狐步舞的世界——老上海——在近十年來也成為了中外學者重要的懷舊思潮的場所，眾多會議和大量書籍都圍繞着這一話題展開。不可否認，近代的上海是一座充滿華麗的悲欣，可以瞥見、可以回憶、可以愛戀的世界都市。也許因為要將專家學識略達於公眾之平常感知，今天國人大量關於老上海的所謂研究作品很容易流入對上海地方史方

方面面「窮形盡相」的重復描繪，遺憾的是又不如張愛玲的小說和阮玲玉的電影來得傳神和親切。另一方面，民國時代的啓蒙話語穿越了時空的距離在新啓蒙的時代獲得延續，重復着中國現代性的主題，在國外某些學者所謂世界主義或者學術規範的名義下，中國的現代性總是無可避免地成爲某種資本主義形式的副產品。即使將老上海作爲研究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集中展示之地，把主體構成的複雜過程僅僅用比較文化研究中所習慣預設的中心／邊緣、東方／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來歸結也實在太過簡單。現代性在中國特定的地方實踐中往往表現出服從與否定的雙重過程，它在具體地區範圍內修訂和再創造，轉化爲內在固有的範疇。因此，老上海的魅力應該遠不止這座城市聲色光影的繁華誘惑，揭示這種誘惑究竟是如何建構的思考與探詢也許才是對今日學者更大的誘惑。

以此難抵「誘惑」之心，筆者拜讀了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葉文心（WEN-HSIN YEH）女士的新著《上海繁華——經濟情味與現代中國的形成，1843—1949》。作者表示，本書是圍繞民國時期上海中產階級的生活和自由勞動力市場展開的，可是作者的關懷、視野和思考空間其實遠遠超越了這一主題本身。

在書的前兩章中作者提出了以下的疑問：鴉片戰爭後中國新出現的經濟精英是如何建立起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面對中國政府，他們如何獲得再分配的政治和文化資源以爲其所用？這種情況爲何會出現？又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他們的這種地位消失了？作者認爲，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於理解20世紀中國中產階級社會地位的形成及其狀況。19世紀下半葉，一種新的商業文化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出現，與傳統商人相比，新的買辦商人的不同不在於失去了什麼，而是他們必須要學習新的內容，包括外語技巧和國外的新知識。伴隨着不斷的戰爭和條約，中西之間的貿易逐步擴大，經濟事務已不再局限於私人商業的範疇，它和國際事務一樣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洋務運動時期官督商辦企業爲部份政府官員運用其巨大影響力發展近代企業提供了契機，商人和官員作爲經營者和投資者的靠近並不能保證兩者的和諧一致，但是官督商辦的架構使新商人找到了自己在官僚體系中的地位，同時官員也能借機攫取買辦商人的財富並利用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知識。在19世紀最後十年改革和革命的政治氣氛中，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意識到要發展新型商業就必須要教育和培訓新知識，商務學堂、商報、商會和商部都應運而生。1903年，晚清政府頒佈了「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並且開始組織管理各地的商會。於是商人和政府之間開始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新式商人不僅在商業中和社會上

贏得地位，而且在晚清帝國的官僚體系中也佔據了重要地位。在同一過程中政府和商人都在實現各自的近代化。工商業日益成為國家和政府的關注點，商會開始出面組織「購買國貨，抵制洋貨」的運動，晚清政府關於貿易指數的定期報告成為衡量國家和政府經濟健康與否的重要因素；後來民國時期，政府又嚴格掌控着專業教育、職業培訓、公司許可經營、商業註冊等等。因此，20世紀初開始，「經濟主義」成為了思考商人和經濟在中國政府和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新途徑。而與此同時，在上海一種基於新商人的財富和消費的新生活方式也逐漸出現。

20世紀初輕工業生產在上海的發展大大改變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者通過對上海百貨公司、商業廣告和支持國貨運動的具體分析展示了城市空間視覺活力的變化，尤其是在現代商業文化的形成過程中人與週圍環境的交互影響。除了空間的變動，時間對於傳統鄉村和現代商業都市里生活的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城市裡的各種機構、公司制度、交通運輸都是具有準時性的，因此城市人口必須培養一種不同於傳統封建社會中的時間概念，並作出自己的時間安排：工作時間、上下班時間、餘暇時間、學習培訓時間……在勾勒了上海20、30年代銀行職員的日常生活之後，作者認為這一時期的上海就出現了類似後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單位」系統。

本書所研究的上海「中產階級」是指城市中受過一定教育（從小學到中學不等）的從業人員，這些人沒有顯赫的名聲，表面看來，他們平常的生活就是乘電車上下班，購物，看看電影，閱讀報刊，到郵局寄送郵件，偶爾去餐館吃飯，他們是處於少數城市精英和大量農村流動勞動力之間的人群，即通常所稱的「小市民」。因為「現代性」不僅包括舒適的物質生活，也有倫理道德的培養。那麼如何研究20世紀上半期上海「小市民」的道德倫理和精神狀態呢？作者非常巧妙地選擇了以「職業青年」為主要讀者對象的《生活週刊》，這是1920、1930年代上海小市民中最流行的刊物，該刊物設有「讀者信箱」欄目，登載了讀者來信和編輯鄒韜奮的回信，其中所討論的內容涉及到了當時上海小市民所普遍關心的職業道德、個人修養和事業成功的關係問題，核心家庭的出現和傳統大家庭的倫理衝突，自由戀愛和職業婦女的地位，甚至洋媳婦嫁入中國家庭等等，「《生活週刊》所體現的中產階級關於家庭和工作的想法，他們自我提升和自我滿足的意識，不僅對個人幸福有價值，而且也有益於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頁119-120）到了1930年代中後期，上海的報刊雜誌中開始出現大量的紀實性個人生活報導，人們開始探討市民生活的困苦，經濟的衰退和戰爭的臨近使得上海的小市民越來越缺乏安

全感，在公正的社會裡過上幸福的生活始終是人們熱切的期望。這也正是到1940年代末上海的小市民支持共產黨政權的原因。

「作爲一個高瞻遠矚的城市，上海的現代形象不斷地被重新設計，鴉片戰爭之後的上海幾乎沒有內省地探詢自己的城市歷史。無論是追趕資本主義繁華還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20世紀大部份的時間裡，上海總是在通過否定它的過去來衡量它的進步。」（頁207）在20世紀90年代上海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21世紀」的新政策導向下，這個城市又再次定位自己。在此背景下一系列關於上海近代歷史的資料發掘和各領域的研究計劃和研究工作廣泛展開。但是歷史似乎總是被作爲思想意識的陪襯。90年代的上海歷史研究擺脫了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對抗殖民主義的正統觀點，大量的歷史研究集中在印刷、出版、報刊、教育、建築、時尚、戲劇、社會組織、本土自治、風俗改革、家庭生活、婦女地位、移民融合、商業推銷、店務管理、飲食、廣告等方面的記錄。長期被稱爲「東方巴黎」的老上海在新一代中國歷史學家看來既不是殖民主義的結果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果，而是上海人從西方得到靈感進行革新的結果。對1949年前上海歷史的重寫就這樣重新建構了城市發展的譜系，並爲開放政策提供了本土的基礎。作爲歷史研究者，我們尊重城市的記憶，也爲其繁華所誘惑，但只有在去掉將上海作爲全球化目的地的歷史重心時這座城市過去的記憶才能得到真正自我表述的機會。

陳莉

廣州美術學院附中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455頁。

近年來涉及日治時期臺灣博覽會的研究多爲個案研究。日本學者松田京子《帝國的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的展現》（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一書，以1903年大阪第五屆國內勸業博覽會爲研究對象，探討19世紀末日本如何以已淪爲其殖民地的臺灣作爲「異文化」的代表，模仿西方帝國建構殖民地次等的「他者」和日本優越的「我者」的論述。程佳惠的《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的研究基調與松田京子一致，亦透過博覽會慶祝活動闡述日本殖民者